

寻找慈善传统

中国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下)

■ 牟艳 张艳霞

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转型

近代体育义赛具有“寓善于乐”的显著特征,构建了近代新型筹款模式。体育义赛融合娱乐性与公益性,通过体育赛事的观赏性吸引民众参与,实现“一举两得,既欣赏球艺,又造福灾民”。如1938年圣诞节期间,由港侨体育界非常时期工作服役团组织的香港中华队与西工程队滑稽化装足球赛,球员们有的化身军官,有的扮作书生,还有的身着女装,花样百出。1941年3月,女生文协会举办记者伶星篮球义赛,滑稽镜头层出不穷“刘杜康、周巨华、冯应湘、蒋君超,屡作滚地葫芦之雄姿”。这种新型的筹款方式将娱乐与慈善紧密联系,不仅通过门票销售、奖券劝募、义球拍卖等方式拓宽了慈善筹款的渠道,而且也使慈善者“既可享受无上之眼福,又能博得乐善之荣誉”,突破了中国传统慈善理念的局限性,促进了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现代化转型。

从救济范围来看,中国传统慈善救济活动范围多局限于本籍或本地,内容多集中在育婴、恤贫、施棺、施粥等基础救济,且筹款效率与覆盖范围非常有限。随着近代交通和通讯的发展,慈善救济范围不仅打破了地区与行业的界限,而且开始走向国门,参与国际性人道主义救援。如1928年7月,李惠堂带领乐华队出访菲律宾,1929年远征东南亚,“每场比赛不下万人,义赛收入竟达十二三万,该款除支付比赛费用外,悉捐慈善机构”。救济对象涵盖自然灾害受害者、难民、伤兵等多元群体。不仅如此,国际合作的义赛筹款活动也比较常见。如1934年9月,优游足球队与法商足球队于逸园举行慈善足球赛,门票收入中西各半。1940年4月,丽都体育会

及法国战事救济委员会联合发起举办慈善足球赛,对垒者为丽都与法商,以充法国战事救济及上海难民救济经费。实现了本土关怀与国际援助的价值统合,扩大了慈善救济的对象和范围。

从慈善力量的构成来看,近代体育义赛促进了慈善主体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力量多元共治的转型。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主要以官方机构为核心,民间慈善力量较为薄弱,而近代体育义赛通过整合政界、体育界、文艺界、工商界、学界等多方社会力量,出现不同群体跨界联合办赛的现象,一场比赛常汇聚多方力量。如1939年1月,中国新闻记者公会为筹赈难民举办的足球义赛“派伶星足球队出场,与记者足球队对抗……派出女生担任表演各种新异体操,并有男生举行各种惊人表演……劝捐奖券者,则请女明星与名媛担任”。形成跨阶层、跨行业共同协作的社群网络,这种结构转型打破了传统慈善的阶层壁垒,加速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转型。

推动中国体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有学者指出,“体育义赛表演是严肃的爱国行动”,体育义赛突破了中国传统体育的教化与消遣娱乐功能,发挥了体育在强化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动员的作用。全面抗战时期,《南华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将赛事宣传与民族救亡深度绑定,赋予体育义赛更深层的意义,指出“义赛一方面可以在抗战中站在体育的岗位做些救亡工作,一方面可以增加港澳间侨胞们的情感和团结精神”。1938年10月,星队、中青队、南华队、钟声队四团体联合组织篮球筹赈义赛,《大公报》发出“体育界救国,不应落入后……救国要紧,有力出力,



1946年在厦门举办的一场篮球义赛

有钱出钱,实不容多加考虑了”的呼吁,有效地调动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和爱国捐赠动能。全面抗战爆发后,球王李惠堂曾辗转于“广东的韶关、五华、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共举办了138场义赛,收入全部用于捐助救灾”。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感情和社会责任感。由此可见,体育义赛不仅突破了身体层面的“体育救国”,而是将体育与民族情感紧密链接,把体育义赛转变为民族主义爱国实践,完成了体育社会功能的战略性升级。

不仅如此,近代体育义赛通过媒体传播革新、公信力机制建设及现代技术嵌入,实现了体育慈善从传统伦理向近代社会化的转型。运作模式上,体育义赛打破了传统慈善活动的局限,通过系统化、规范化的现代化手段实现社会动员。如体育义赛通过报刊媒体构建了覆盖赛前、赛中、赛后的全流程传播网

络,改变了传统依赖善书、家书、邸报等单向、低效的信息传递方式,显著提升传播效率。并借助报刊媒体

的收入和捐款去向,“共收入四千一百六十二元四角八分,内卖票三千六百六十二元四角八分……支出场费六十五元二角,印票费二十一元五角,点心车费三十五元五角。出入相抵,尚余四千零四十元二角八分,充仁济医院经费”。用公开透明的数据消除公众疑虑,形成了媒体监督与社会信任的良性互动机制。

与此同时,近代体育义赛通过创新比赛形式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取得了良好的筹款效果。如当时不仅有以中西慈善足球赛为代表的大型专业性义赛,而且也有以注重参与性和趣味性的小型足球义赛。小型足球赛规模相对较小,场

地要求不高,通常面向社会各界开放报名,无论是专业球员还是业余爱好者都可参加。如1941年9月,信远烟草公司为胶州路贫儿教养院筹募经费发起举办“可可杯”慈善小足球赛,观众不下四千人,创空前盛况,所得门票收入共3189元,悉充教育基金。

此外,体育义赛在募集机制和技术应用上逐步引入现代化手段。体育彩票这一近代新出现的商业募捐模式被采用,如1932年12月,上海万国慈善赛马“发行奖票十万张,每张售银十元,提成救济沪北灾民,奖票一经发行,购买者之踊跃争先”。彩票是一种舶来品,属于商业行为,虽存在管理争议,但客观上推动了慈善资金的规模化募集,成为近代体育慈善事业与商业资本结合的典型案例。在技术应用上,体育义赛开始使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如在1946年10月,津沽华盛与洛阳

地要求不高,通常面向社会各界开放报名,无论是专业球员还是业余爱好者都可参加。如1941年9月,信远烟草公司为胶州路贫儿教养院筹募经费发起举办“可可杯”慈善小足球赛,观众不下四千人,创空前盛况,所得门票收入共3189元,悉充教育基金。

益言堂

从“兜底保障”到“发展型救助”：社会救助法所蕴含的公共政策范式转换

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补齐了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顶层立法短板,推动新时代民生保障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新阶段。

■ 刘秀琼

经过多年建设,我国传统社会救助以生存兜底为核心,构建起保基本、救急难的制度框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绝对贫困底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的社会形态、民生风险、群众诉求发生深刻变化,传统“重兜底、轻发展”救助模式的短板逐步显现。社会救助法顺应时代需求,实现了从生存型兜底保障向发展型赋能救助的范式跃迁,对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传统兜底保障的制度价值与时代局限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为主体的生存型救助体系,定位聚焦于生存兜底。该制度以化解绝对贫困为主要目标,采取现金、实物等帮扶方式,重点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面向孤寡老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丧失劳动能力群体开展重点保障。在脱贫攻坚进程中,实现了应保尽保、应救尽救,消除了绝对贫困,织密社会稳定的民生底线,是我国

社会保障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为特定发展阶段的制度设计,传统兜底保障带有事后救急、维持生存的鲜明特征。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制度局限性逐步显露。一是救助理念偏于被动,多在生存困难发生之后介入,缺少风险预判和源头防控意识;二是救助目标较为单一,主要解决生存问题,对困难群众能力培育、社会融入关注不足,容易产生依赖,难以实现稳定脱困;三是救助供给结构失衡,资源集中在现金和实物,心理疏导、技能培训、照护服务、就业支持等服务供给不足,难以回应相对贫困、家庭刚性支出负担过重等新型民生矛盾;四是运行机制较为碎片化,救助层级划分简单,部门协同衔接不够顺畅,社会力量参与渠道有限,应对常态化、多样化民生风险的能力有待提升。

现阶段,民生需求已从“生存温饱”转向“发展提质”。单纯以保生存为核心的兜底范式,已经难以适配共同富裕的时代命题,社会救助制度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新实施的社会救助法构建发展型救助全新制度体系

新实施的社会救助法并未弱

化兜底保障的基础功能,而是在守住基本生存底线前提下,在法定原则之上推动救助功能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展,从理念、目标、供给、机制四个层面完成公共政策范式革新,搭建起发展型救助的制度框架。

其一,救助理念从“被动救急”转向“主动赋能”。传统救助属于事后救济,重在化解已经出现的生存危机。新法更新价值逻辑,改变“重危介、轻培育”的惯性,把激发困难群众内生动力、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摆在突出位置。法律明确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支持和引导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自助自立、解困脱困,完善就业救助相关制度安排,引导具备劳动能力的受助对象通过劳动改善生活,改变单向“输血”模式,推动受助群体由“被动受助”转向“主动发展”。

其二,救助目标从“单一生存保障”转向“三维协同发展”。新法跳出仅保障生存的制度惯性,建立“生存兜底、风险防范、发展赋能”三位一体的目标体系。在持续保障特困人员等深度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基础上,新法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纳入制度覆盖范围,重点防范因病、因学、因灾带来的返贫致贫风险,着力破解发展机会不均、发展能力不足等深层次问题,保障困难群体平等享有发展权利。

其三,救助供给从“单一物质帮扶”转向“物质+服务”综合赋能。以法律形式明确国家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是社会救助法的

一大亮点。针对物质救助的固有局限,法律明确把生活照料、心理关爱、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监护关爱等纳入救助服务范畴,面向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失业困难人员等提供差异化服务,以物质帮扶解决燃眉之急,以专业服务补齐能力短板,让社会救助兼具保障力度和人文温度。

其四,运行机制从“粗放处置”转向分层分类、多元协同治理。新法建立分层分类梯度救助体系,厘清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临时遇困人员等不同层级的救助边界,改变过去“一刀切”的粗放做法。新法推动构建事前预警、事中帮扶、事后巩固的全周期实践链条,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实现民生风险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

发展型救助范式的核心治理价值

由兜底保障迈向发展型救助,不是局部政策修补,而是民生治理理念与公共政策逻辑的系统性重塑,蕴含多重时代价值。发展型救助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支撑。共同富裕追求共建共享,不等于平均主义。传统兜底保障守住“不落一人”的生存底线,发展型救助进一步聚焦发展层面的提质增效,通过赋能式帮扶缩小能力差距,让困难群体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底线公

平与发展公平相统一,夯实共同富裕的民生基础。

发展型救助推动民生治理从“危机应对”走向“风险治理”。传统救助多主要应对已经发生的生活危机,发展型救助突出源头治理与关口前移,依托动态监测识别潜在致困因素,提前介入干预,减少困难家庭陷入困境的概率,增强整个社会抵御民生风险的韧性。

发展型救助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抓手。发展型救助充分调动政府、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多方力量,依托精细化帮扶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化解基层民生矛盾,同时尊重困难群众的主观地位,调动其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性,实现民生保障与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推动发展型救助范式的落地见效

释放社会救助法的制度效能,需要直面基层现实条件,补齐实践短板,把发展型救助落到实处。

第一,更新治理理念,把握兜底与发展的辩证关系。破除“重物

质、轻服务”“重救急、轻赋能”的工作惯性。必须明确,兜底保障仍是社会救助的首要职责。对无劳动能力、生存陷入困境的群体,不折不扣落实兜底责任;对具备发展条件的困难对象,更加重视能力培育和就业救助引导,树立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一体化工作思路。

第二,完善配套细则,做实分层分类救助制度。加快研究制定配

征轮两队为筹集医院资金举办篮球义赛,尝试使用电动售票机,“效力非常,敏捷正确,如无其他缺憾发现,以后将永久采用”。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体育义赛在慈善理念、救济范围、慈善主体、募集方式、技术手段等方面均与中国传统慈善活动有所不同,突破了中国传统慈善活动的局限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慈善与体育事业的现代化转型。

综上所述,体育义赛是中国近代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慈善和筹款方式,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阶段具有时代特征的体育社会现象。它的兴起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方面的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体育义赛的举办既迎合了民众需求,满足了娱乐身心的同时又能进行慈善救助,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参与,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各界的社会责任感,展示出了社会力量在近代中国体育事业和慈善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政府保障能力不足时,近代体育义赛在赈灾、支持抗战、难民救助、助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将人们的爱国情感转变为支持国家民族的实际行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慈善事业和体育事业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体育义赛也存在着诈捐、骗捐、善款侵吞等诸多问题,违背了慈善救济的初衷和原则,损害了体育慈善事业的社会形象。鉴古知今,我们应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激发社会参与的热情,加强体育慈善文化的建设,提升社会各阶层的慈善意识,促成政府与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同时,应大力推动体育事业与慈善公益事业的融合,以更好地发挥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转自《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原标题《体育与慈善:中国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1924—1945),有删减》)

套法规、地方实施细则,细化各类困难家庭认定标准与救助梯度。健全动态监测、精准识别、就业救助、有序退出等机制,区分生存困境、刚性支出困境、临时突发困境,推行一户一策,既做到应救尽救,又防范救助依赖,维护制度公平可持续。

第三,做强服务救助,促进“物质+服务”深度融合。用好政府购买服务工具,培育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力量,重点发展就业技能培训、心理干预、家庭支持、特殊群体照护等项目。优化救助资源配置,扭转重资金、轻服务的资源投向,切实提升救助的长期效果。

第四,强化多元协同,构建共建共治的救助格局。打通民政、人社、教育、卫健、医保等部门的数据壁垒,建立信息共享、风险会商、联动帮扶工作机制。畅通慈善力量、志愿服务参与渠道,形成政府兜底线、社会做补充的合力,最大化释放制度效能。

结语

社会救助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在兜牢底线基础上,开启向发展赋能拓展的范式转型,充分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时代社会救助工作,既要坚守民生底线,筑牢安全保障网,也要聚焦长远发展,激活内生动力,以法治化、精细化、现代化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民生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